

我与胡风

● 梅志 著

名人之侣丛书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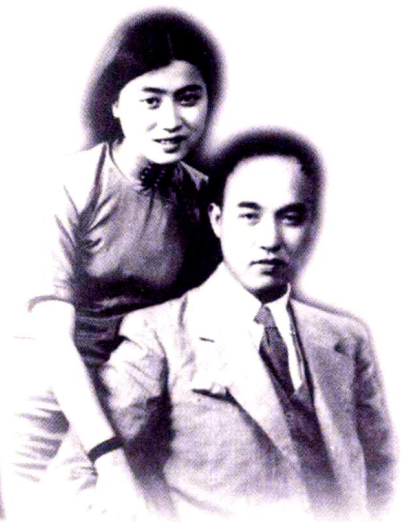


梅志 著

名人之侣丛书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我与胡风



MINGREN ZHI Lü CONGSHU

名人之侣丛书

WO YU HU FENG

我与胡风

梅志著

☆

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南宁市鲤湾路8号

邮政编码:530022 电话:5850219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gep.com.cn>

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@gep.com.cn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80×1230 1/32 4.375 印张 插页 6 129 千字

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 册

ISBN 7-5435-2799-5/I·222 定价:1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工厂联系调换

前 言

好多年前，广西新闻出版局陈肖人同志曾向我约写《我与胡风》。我虽一直未能写出，他送我的这套“名人之侣丛书”倒也读了不少。几本书写得都很好，我也想试试，所以并未推却，只是一拖再拖，直到我将《胡风传》写完，才想起应抽出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。

应该说明的是：这本十来万字的文稿，是我写《胡风传》的附属品，也可说是外传、别传——因我从它那里取用了许多断片、特写。有一些需要突出的，我则加大了力度，加上了我和胡风个人共同生活的材料。要完全重写，我是实在力不从心了！

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感叹：快十年了，胡风去世也已十一年！我总算完成了这个承诺，但在整理这些生活片断时，我的心情还是十分沉重的，好像又重温一次我们那段漫长的苦难生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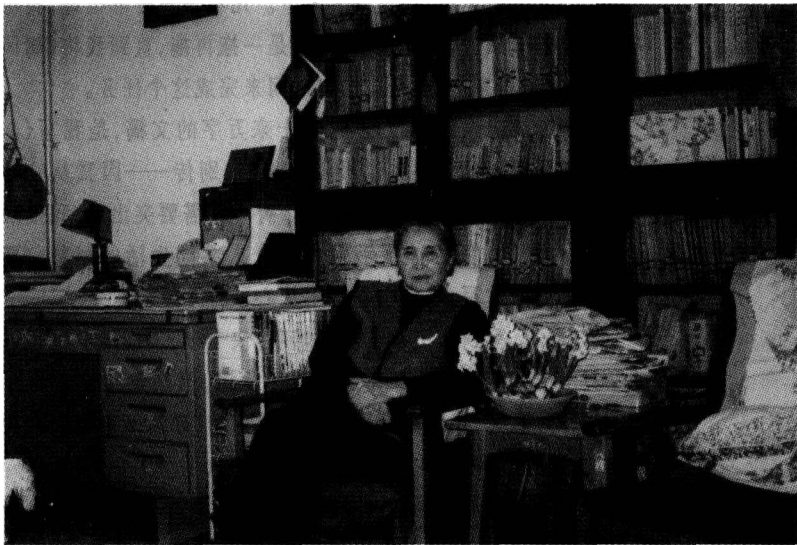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胡风共同生活了五十二年，说起来是聚少分多：抗日时期我们去逃难，经常躲警报、挨轰炸；后来在大后方，胡风去城里工作，忙于生计，忙于出刊物、教

书,我们很少有安逸的生活;盼到解放了,又为别的原因,上海、北京,北京、上海地奔波;最后胡风“捉将官里去”,一别就是十年,我们被隔离审查,共同坐牢……

直到失去自由二十四年后,我们才算是恢复成为不带反犬旁的人,能行走在大街上了。在这二十多年的苦难生活中,我只有一个信念:我们最终一定能恢复成一个真正的“人”!因为我相信自己,也相信他,哪怕是分隔在天涯海角,我们都能相依为命!我们终于盼到了这天!

当然付出的代价可不小:胡风的整个身体都在受难的年月里被损坏了,尤其是脑神经。但他在身心稍平静后又拿起了笔,写他想写的心里话,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利用这个盼了二十余年好不容易得到的自由,也过上几天清闲的游山玩水的日子。而他终

作者近照。



于因坐着书写时间太长，痔疮、前列腺肿大等病复发，住院开刀又诱发了脑神经疾病，非但不能再写东西，疾病也缠绵难愈。这好不容易获得的自由，就在病痛的折磨中又浪费了两三年。

及至身体稍好，心情平静下来，他又笔耕不辍，在这最后的两三年时间写了一二十万字。直到酝酿已久的“鲁迅先生”这一主题写了四万余字，他才算是搁下笔，说了一句：“我还有许多要写的。”而不得不再一次住进了医院。

这时检查的结果是胃贲门癌细胞已开始扩散，医院对动大手术无把握，我们也不愿拿他来冒险，让他受开刀之苦，就决定用中医、西医相结合的方法来治疗。结果是回天乏力，他只支持了三个来月，在自己并不知道患有绝症的情况下，终于因抢救无效而与世长辞了！

入院前，他还在计划着要写几篇文章，尤其是“鲁迅先生”这个题目他仍觉得意犹未尽，还有许多可写的。而现在，曲未终，人已逝，他的一些宝贵的回忆和对先生的更深入的评价只能随他而去了！

鲁迅先生曾说：“长歌当哭，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。”斯人已逝，复欲何言！只能以这散笔淡墨，聊作追忆昔人的浅吟低唱。

梅志

1996年9月15日

目 录

前言

生活从这里开始(1933—1937)

● 初识到相知

1

● 定情

10

● 共同生活的开始

12

● 有了爱的结晶

18

● 在『宫』里招待鲁迅先生

33

● 编《海燕》和『两个口号』之争

45

● 在悲痛的日子里

56

● 抗战风云突起

69

八年战乱与天亮前后(1937—1955)

● 颠沛流离的生活

72

● 《七月》与《希望》

76

● 天亮后的暴风骤雨

86

风雨三十年(1955—1985)

91

● 十年后的重见

91

● 是探监，不是探亲

94

● 第三次见面

96

● 情与法

98

● 团聚与离别

100

尾声

● 姗姗来迟的自由

● 转机

● 是他，又不是他

● 他被带走了！

● 冬去春来

● 病倒了

● 深夜送出成都

● 好地方，坏心情

生活从这里开始 (1933—1937)

从1933年到1985年,我和胡风共同生活了五十二年,其中包括被迫分离的若干岁月。这五十二年,我饱尝了那么多的酸辣苦甜,那么多的幸福和惨痛,真是一言难尽!但在选择与胡风相爱并共同生活这一点上,我却从未后悔过。公安部预审员曾骂我是“死顽固”,而我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,我不能违心地指控自己选定的爱人。当他们给我暗示胡风的一些“罪名”时,尤其令我感到好笑,反更增加了我对胡风的信任。因为这样一来,倒揭穿了他们对胡风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”的险恶用心。凭着我和胡风几十年共同生活结下的深厚感情,我甘愿当“死顽固”,追随着胡风这个“反革命”而无怨无悔。这大概就是我的“命”吧!

初识到相知

我是在1933年夏天认识他的。在回忆这第一次



胡风,1932年于东京。

见面时,我先得将我们两人各自的情况交代一下。

胡风当时刚从日本回国。他在东京留学期间参加了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左联东京支部,还是日本普罗文化组织的成员,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并宣传抗日。这年3月,他被日本警方逮捕,受到拷问。他坚不承认指控他的罪名,没有暴露他的组织关系,警方在拘留他三个月后,只得将他和其他十多人一起驱逐出境。到上海后,他暂时借住在也是左联盟员的老朋友韩起家中,那是在虹口区施高塔路四达里某号的三楼,韩起及夫人董曼尼和一岁多的孩子住前面,后面有一小间正好让胡风住。

一天,周扬陪鲁迅先生来四达里看他,这可真使他感到惶恐:自上中学时接触鲁迅的作品以来,他一直对先生仰慕万分。20年代他在北大读书时,曾听过先生的课,又在翠花胡同的北新书局多次见到过先生,甚至一同拿起一种新书来看,但那时他不敢主动去和先生攀谈。而现在,突然地先生竟亲自来访,这使他十分不安。小屋里只有一张小铁床和一个小凳,无法招待客人,幸好韩起夫妇不在家,他便请先生和周扬到前楼去坐。先生却不在意,态度很平和,像对老熟人一样,没有任何客套,基本上谈工作,扼要而又具体地谈及左翼文学的主要斗争对象,说得那么平易而坦率,这平和的态度于胡风而言似出意外而又在意中。先生最后对胡风说:将来你在这方面可以做些工作……先生的信任使胡风的心中涌起一股热流,但他又觉得自己缺乏足够的学识和魄力来担负先生所提示的斗争,为此心中很是感到不安。从这次见面后,他开始了和鲁迅先生的亲密交往,从先生处得到了最宝贵的文学道路以至人生道路上的指引。

当时,他以“谷非”为笔名写作,在左翼文坛上已是一位小有名望的文艺理论家。回国不久,周扬便通知他,要他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职务。当时周扬是组织部长兼党团书记,左联的书记是茅盾。三个月后,茅盾辞职,周扬决定由胡风接任,他自己改任宣传部长,调卢森堡接管组织部。实际上,宣传部的工作原封不动,仍由胡风管。

我的情况则完全是另外一种了:我出生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庭,除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外,还有两个亲妹妹。我的原籍是江苏武进(现在的常州市),但从小客居在江西的赣州,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,后来我们到了南昌。1927年大革命后,我们一家又回到赣州。那里的革命空气十分浓厚,我在学校读书时参

加了妇女解放运动,当时我只十四五岁,胆子很大,很容易接受新思想,常随着大家一起游行,唱着《打倒列强除军阀》的歌子,还到乡下去做妇女解放的宣传工作,俨然是个活跃分子。这时,我阅读了一些新书和新杂志,自己也买了鲁迅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及其他一些毛边书。我的一位老师送我一本《语丝》合订本,我也似懂非懂地读着。

我住的房东家还住着他们的一家从外地逃难来的亲戚,其中有一位姓钟的青年,当时可能是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,他常对我和他的侄女们讲些浅显的革命道理,鼓励我们参加游行。后来他介绍我和他的一个侄女参加党的外围组织——青年干社,当时我们连表格都填好了。不久,县里发生了诱杀工会主席陈赞贤的惨案,引发了工会和农会的大游行和大抗议,这之后就开始了白色恐怖的“清党”,蒋介石的军队开了进来。幸好消息传来得早,一些进步的革命青年连夜逃离了县城,我们的那几张表格,好在那青年还没有交出去,他就在逃走前将它们烧掉了。

这之后,我们在白色恐怖中度过了两三年,眼看着那些靠发“剿共”财起家的大小军官们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,老百姓为了应付军饷弄得几乎没法生活。尤其是“国军”对被他们抓获的共产党员进行残酷杀害,枪毙之外还要剜心砍头,这使我对国民党更增加了嫌恶和仇恨。

1931年,就在国民党对苏区发动的第二次“围剿”失败后,赣江通航,父亲带我们来到上海。他不敢带我们回武进老家,原因是他操劳了几十年,还是一个两手空空的穷秀才,会被亲戚们看不起,还乡就只好成为梦想了!但在上海父亲又找不到工作,他的教书本领在这里根本吃不开,一家五口在这米珠薪桂的上海加入了失业者的队伍。不久,连房东太太都怀疑我们会赖房钱,冷嘲热讽地想下逐客令。在上海的异母兄嫂一再警告我们姐妹三人,说上海的白相人多,不要上街去乱跑。我只差一年就能高中毕业,但继续读书的愿望,我连提都不能提,因为哥哥说:上海的学校你们考不进,学费也贵得吓人。这真使我丧气,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愁眉苦脸、悲观失望的女孩。这时,我订了一份邹韬奋编的《生活周刊》,它按时由邮差送来并放在我住处的楼梯上。我从它那里得到了鼓舞,明白了只有自己努力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道理。

不久,我们又遭逢“一·二八”日寇对上海的侵略和疯狂的烧杀。我家住在华界的南市区,不安全,只好由我这大女儿将一家老小和一些自以为值钱的破

箱笼搬到法租界。我押着那些行李，坐在黄包车上，挤在当时留给进法租界爱多亚路的惟一一个铁门口。眼前是车子打堆，行人挤满，简直无法通行。给我拉车的是一个中年人，他很有经验，用手推开了许多辆拦着他的车，很快就挤到前面去了。在他前面是一个青年人拉的车，不知何故被头戴笠帽的安南（即今越南）巡捕用皮鞭抽打着。我的车夫赶快停下，我也吓得要死，结果是，那安南巡捕用皮鞭在我的脸上轻轻划了一下，就准许我们将车子拉了进去。车子进了铁门，车夫回头向我笑了笑。我的心里可真不是滋味：自己的国土怎么这样任人践踏，任由殖民者来“维持秩序”？这对我真是上了一堂课，让我亲身感受到了做一个殖民地“顺民”的屈辱。但我也在这场战争中经受了锻炼，不再惧怕我过去曾读过的上海黑幕小说中描写的可怕的故事了。当时我真恨自己不是男儿身，要不我一定会从军，拿起枪去杀敌人。这段生活培养了我的勇气，让我在人生道路上前进了一步。

战争以国民党政府的屈辱退让而告终。这时，我想到，不管兄嫂怎么说，自己还是应该设法将这最后一学期的高中课程读完。我按照报上登的招生广告，跑到了当时仍很萧条的闸北区。我去时乘的电车，回来为了省钱，也为了认路，就沿着电车轨道走了回来。到亲戚家坐下来休息时，我告诉他们自己是走回来的，也只花了个把钟头，正在抹牌的客人不由得咂舌称奇，说那可有多里啊。

我这次的奔波是成功了，不但找到了合适的学校，上了培明女中，还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家教的职位。这样，我每天匆匆地在学校吃完晚饭，就由麦根路直奔我在静安别墅做家教的那家，教两个初小的学生。壁钟敲八下时，我就准备返校。有时，主妇留我下来谈话到九点，我就得飞跑着赶路了，在离校不远的荒僻地方常有流氓出没，我只得咬着牙拼命地向前跑，走到学校时，我已是气喘吁吁的了。那时我真想大哭一场！不过，这些都教育了我：只要自己发愤图强，是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。

忽然有一次，我在街上遇见了在赣州时的那位领导人钟某，他穿着一身工人服装。我只知，他从赣州出走后，到南京考取了中央大学，结了婚，也有了孩子，正是功成名就之时，至于他怎么又到了上海当了工人，我就不清楚了。这次见面，我们彼此都很高兴，因我赶着要去上课，大家不能多谈，他便向我要了我学校的地址。两三天后，他还真的来看我了。

在简陋的学校会客室里，我们谈到别后的情形。我满肚子的愤恨和牢骚，长期憋在心里无处可说的话，一起都对这位过去的领导倾诉了出来。他耐心地听着，一面还点着头，最后说：想不到你这几年有这么大的进步。我也像个大人样地说道：是贫穷和屈辱的生活教育了我。

几天后他又来了。这次，他很严肃地问我看了些什么书。我告诉他，我订了一份《生活周刊》，看过雷马克的《西线无战事》，还看了辛克莱的《屠场》，觉得资本家太可怕了。他说这是他们的本质。最后，他问我想不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（以下简称“左联”），并说那是由鲁迅先生领导的，还有茅盾、丁玲等人，在那里可以受到革命和文艺两方面的教育。我一听到是鲁迅领导的，就像看到了一盏明灯似的，非常热切地表示愿意参加。

鲁迅先生的书我一直珍藏着，即使是在白色恐怖时期，我将红封面撕去后仍常拿出来看，虽然我不大读得懂，但那里面的事物还是使我感动和同情。丁玲早期的《在黑暗中》，我也买了，对书中所描写的女性，我很是佩服她们的勇敢和不同一般女性的见解。只有茅盾的书我还没有看过。

回到宿舍里，我悄悄地将这消息告诉了我的两个要好的同学：她们都是江苏盐城人，一个是比我小几班的胡素心，一个是同班同学徐静筠，她们都要求进步，我们很谈得来。我这一说，她们也很想参加左联，一定要我帮她们说说。我向钟某说明了她们两人的情况和愿望后，他马上就同意了，并和她们谈了话。由他同左联联系，最后说是我们三人都可以参加。

是冯雪峰亲自和我谈的话，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冯雪峰。记得是在静安寺路西摩路附近一处三角地带，好像离培成女中不远，有几张石凳，我们就坐在那里低声地谈话。他问了我一些情况，我都一一回答了。后来他说了一大段话，大意是帮助我提高认识，可惜我对他的浙江味儿的官话听不太懂，只有点头。他很严肃认真，有长者风度，没有一点儿嘲笑我年轻幼稚的意思，我感到他是可敬的、可信任的，我为自己能参加左联而高兴。

后来，钟某带我去见他中学时的同学韩起——他也是左联盟员。我这才知道和我谈话的是冯雪峰，而我们参加左联是韩起介绍的。韩起当时可能在宣传部门工作。我的那两个同学也已谈过话，都被吸收参加了左联。我和胡素心还曾到华蒂（叶以群）家去开过一次小组会，他的妻子梁文若和我们一组。那天，只有华蒂一人在说话，主要是介绍国内外形势，并说我们都是通过特殊

关系进来的,要努力做好宣传工作等。

后来我又被分配在离我工作地点较近的沪西区,由唐伟领导。第一次小组会就在唐的家中,那是个夏日,当时来了七八个人,房子显得有点儿挤,来的人差不多都是附近正文学院和中学的学生,女学生似乎只我一人。唐向我们介绍了一些这个小组的情况,意思是想组织一个文艺学习班。后来,有一个瘦小的青年和我们谈了一些有关文学方面的话,我能听懂的很少。会开得很热烈,不过我没什么可说的,只好一言不发,那时我还是一个见生人不敢说话的怕羞的小姑娘。

暑假后,我就编在了胡楣(关露)领导的小组。胡楣是钟某和韩起在南京时的朋友,我知道她的一些情况,很尊敬她。我们这小组里还有徐静筠和王祖芸。徐已在纱厂当女工,准备组织女工夜校。但不久,胡楣转到了社联,王祖芸进了法政学院,我们这小组也就散了。

我毕业后,本以为有了一张文凭可以找到学校教书了,谁知连小学的门都进不去。于是,我只好接受曾经找我做家教的那家富人的要求,住在他家帮他管家,当上了高级保姆。此后,我又转由王尘无领导。

从第二年春天起,先后有人来我住的地方找我。先是一个女工模样的人晚上来了,交给我徐静筠写的一张字条,告诉我她被捕了,需要零用钱,我拿了十元钱托来人带给她。一两个月后钟某又托人找我,他因为策划英商汽车公司罢工被捕了,我让来人带了十元钱给他,后来他又托人来要我去找他家人设法保释他。这样一来我被主人注意了,给我介绍工作的那个人知道钟某是因共产党罪名被捕,也向主人说明情况。于是,我被客气地辞退了,从此一直没能找到工作。

我家住在当时华界的南市区,我不敢常住家里,有时就住在我的干娘家。干娘在交通大学当女生训导员,对我很好。

夏天的一天下午,我去找韩起,在后门遇见了楼适夷(他是王祖芸的朋友,所以我认识他)。敲门后,韩起夫人董曼尼看到是我们,就把钥匙从上面丢下来,可是钥匙跌断了,只好由韩起亲自跑下来开门。上到三楼,我见到一位体形微胖、已开始谢顶的高个子男人。韩起向他介绍我,说我是左联盟员,也是钟某在江西时的朋友;对我则介绍说他是左联领导人谷非(即胡风。为方便起

见,以下就简称为F),他也认识钟某。F早就从韩起口中听到过他们对我的夸奖,所以对我很有好感。

有生人在场,我更不敢说话了,好半天才对韩起说出来意;因为钟某在狱中有信给我,希望能给他寄几块钱,最好再为他找几本英文书,他想在狱中翻译。我告诉韩起,我现在已失业,没什么钱,书也无处可找。我还请韩起帮我调至法南区,因为我已住回家中。F在一旁听到了我们的谈话,主动从皮夹中取出五元钱交给我,让我寄给钟,并说等他住定后,从他带回的英文书中找找,可能有适合钟用的。看到他那么诚恳地愿意帮助困难中的同志,我也只好收下了。当我正要告辞时,主人商量要加菜留我和楼适夷吃晚饭。F再次从皮夹中取出五元钱,要小汪(汪岌,青年画家,和母亲一起住在下面亭子间里,也是左联盟员)去买些熟肉来。

吃饭时,我感到F总在看我,目光是那么地温暖,我简直不敢抬头,也没吃什么饭菜。饭后不久,我就和楼适夷一道走了。

据他后来的坦白,自这第一次见面后,那天穿着浅蓝色旗袍的我的身影就一直留在他脑海里,使他很难将我忘却,一心想再见到我。

正好,左联为了油印刊物,需要刻蜡版的人,韩起建议让我来担任这一工作,于是F特地写信约我见了一次面。这时,F已由韩起的朋友杨幸之介绍进了孙科出钱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,为《时事类编》翻译时论,以取得生活费(周扬和茅盾都表示同意)。于是,他便从韩起家中搬出,在法租界金神父路、圣母院路附近找到了一家公寓房:一间七平米大的小房,放一小床、一小书桌和一小五斗柜,另有一张小沙发,房钱是每月二十元。

这次见面就约在离他住处不远的巴黎电影院。那天天气特热,他站在电影院门外装作看电影广告,由于体胖怕热,弄得满头都是汗。我准时到了那儿,穿的是一件白色小花布旗袍。他一眼就认出了我,过来引我到了马路对面的一家饮冰室,要了两份刨冰。他实在是太热了,也太过于渴,一份刨冰一下子就吮吸光了,就又要了一瓶汽水,并转过头来问我还要什么。我摇了摇头,我的那份刨冰还没吸完一半呢。他一边喝汽水,一边和我谈工作。虽说是领导,但他一点儿架子也没有,很平易近人,眼睛里闪烁着亲切的笑意,我也就不大拘束了。但一听让我搞油印,我很吃了一惊,忙说:“这工作我可干不了,因为我从来没有刻过油印。”他立即说:“那可以学嘛。”“不是这样,我的字写得